



黄炎培的图书馆实践与观念研究

——纪念黄炎培先生逝世 60 周年

李雅君 周旂*

摘要 文章运用史料钩沉的方法,对黄炎培的图书馆实践进行梳理与分析。在简要回顾黄炎培的生平及其与图书馆的渊源后,从赴美教育考察及归国后的图书馆实践、职业教育发展规划中的图书馆建设等方面阐述黄炎培的图书馆实践活动。黄炎培对图书馆的认识与倡导,与其自身求学、访美经历及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其图书馆观念的特点包括:肯定图书馆对于社会发展的实用教育功能、强调以藏书为中心的图书馆服务与活动、重视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其图书馆观念先进前瞻,且很好地运用到了图书馆实践中。

关键词 黄炎培 图书馆事业史 图书馆史 职业教育 教育史

分类号 G259.2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5.04.013

引用本文格式 李雅君,周旂.黄炎培的图书馆实践与观念研究——纪念黄炎培先生逝世 60 周年[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5,43(4):120-128.

1 引言

黄炎培是我国著名教育家,以职业教育的积极倡导者而著称。在其职业教育思想中,他对图书馆的价值和功用有着深刻认知,并积极推动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然而,以往关于黄炎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在职业教育领域的成就,较少涉及他在图书馆领域的活动。在黄炎培逝世 60 周年之际,论文拟回顾先生的图书馆实践与观念,一方面铭记其对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所做的贡献,另一方面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其事迹和学术遗产。

纵观近几十年的中国图书馆史研究,人物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尤其对民国图书馆人的研究不断推进,清晰地勾勒出一代图书馆人的群像。然而,当前研究对于非职业图书馆人的关注较为有限。以民国时期的教育界为例,目前图书馆史研究成果已经关注到了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等机构对于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并给予高度肯定,然而这些机构决策层的董事会成员们作为非职业图书馆人,通常“隐身”于图书馆史的叙事中,或只见其名不见其事。事实上,以梁启超、蔡元培、黄炎培等为代表的一批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对图书馆的倡导与推动,不仅启蒙了中国社会的图书馆意识,甚至对当时国家在图

书馆事业方面的制度设计也产生了影响,然而当前从图书馆史角度对这些人物的研究展开研究的成果,无论是数量还是深度,都与他们对图书馆事业的卓越贡献不相匹配。程焕文教授曾指出,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近现代图书馆的历史就是一部国人立足图书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史^[1]。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奋斗的群体包括了来自各个领域和阶层、所有为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做出贡献的人士,他们都值得被书写和铭记。

黄炎培是近代中国教育界重视和积极推动图书馆建设的代表人物之一,有鉴于以往研究对其图书馆活动和观念触及较少,论文使用史料钩沉的方法,在回顾其生平及与图书馆渊源的基础上,重点探究其赴美教育考察的经历以及对其图书馆实践的影响,最后对其图书馆观念进行评析。

2 黄炎培生平及其与图书馆的渊源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江苏川沙(今上海浦东)人,是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近现代职业教育理论奠基人之一、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著名的民主人士和社会活动家,参与了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两个民主党派的创建,是中国民主同盟的首任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 通讯作者:周旂,邮箱:zhouyi37@mail.sysu.edu.cn.



成立以后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工业部部长。

黄炎培 1901 年入南洋公学学习新学,受教于蔡元培;1902 年中江南乡试举人;1903 年返乡创办川沙小学;1905 年创办闻名江浙的浦东中学;辛亥革命后,曾历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等职,推动了江苏教育的改革和发展;1915—1917 年期间,多次赴美国、英国、日本、菲律宾等地对教育做短期考察;1917 年,联络教育界和实业界人士,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次年创办中华职业学校,由此倡导和推行以职业教育为中心的行动。1926 年,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原则,并在农村进行教育实验改革。抗战期间,积极参与抗日救国运动,兼顾职业教育事业发展。

就黄炎培的一生而言,尽管他本人并不是一位职业图书馆人,但却始终与图书馆联系紧密。南洋公学求学时期,时任特班总教习的蔡元培列各修学门类及每门应读之书,学生们常需向图书馆借书^[2],这一细节在 40 余年后其所作的《吾师蔡子民先生哀悼辞》中仍被提及,可以视为黄炎培在蔡元培影响下注意图书馆的开始。1913 年,黄炎培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时,曾列《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在讨论社会教育时提到“设立图书馆、博物馆”等举措^[3]。1915 年,赴美考察教育,兼及考察图书馆。此番回国后更加重视图书馆建设,希冀通过图书馆推动职业教育发展。

梳理黄炎培在教育界的任职情况,就会发现其担任职务的时期与该机构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时期在时间线上高度重合。如 1921 年 12 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京正式成立,黄炎培是该社九位董事之一。中华教育改进社从第一届年会开始就设立图书馆教育组,并成立了图书馆教育研究委员会,李刚将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组视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专业化的一个重要源头^[4],吴稼年则认为其是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孵化器^[5]。1924 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成立,黄炎培也被推举为十五位董事之一,而该基金会在中国图书馆史上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为文华图专与若干大型图书馆提供经费资助、实行助学金制度及招收图书馆学免费生。倘若以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为代表的教育界高度重视图书馆建设和发展,是民国时期新教育运动的重要特点之一^[6],那么考察新教育运动的中心地就不能不注意到江苏省。1918 年 10 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江苏省教育会召开第四次会议,这次会议在新教育运动史上是一次标志性的事件。而此时担任江苏省教育司司

长、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的正是黄炎培。

如果说对上述时间线与史实的梳理,最多只能看出黄炎培作为教育界领袖人物之一,在参与所在机构、团体行动决策时对于涉及图书馆的活动予以支持的态度,并不能作为其在实践行动层面投身图书馆建设的直接证据。那么以下各种个人行动层面上的图书馆活动则足以表明黄炎培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其在 1925 年初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华图书馆协会筹备委员会;担任上海图书馆协会编辑委员会名誉编辑;多次与他人联名发起图书馆募捐,用以资助上海图书馆、东南大学孟芳图书馆、松坡图书馆、南洋公学图书馆等;与当时的许多图书馆界人士,如韦棣华、沈祖荣、杜定友、吕绍虞等均有交往。而本论文也是意在利用目前已获得的零散史料将黄炎培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联系具象化。

3 赴美教育考察及归国后的图书馆实践

3.1 考察并撰文介绍美国图书馆事业

1915 年 4 月,北洋政府农商部组织实业团赴美国考察旧金山世博会,黄炎培受邀同行考察教育。当时,美国正处于世界图书馆运动的中心^[7],黄炎培感叹美国“全国之中如国立图书馆、学校立之图书馆、私人立之图书馆等,殆不可胜数”^[8]“以炎培游踪所及,……规模之宏壮,卷轶之繁富,令人惊叹欲绝”^[9]。

这次考察历时 3 个月,回国后黄炎培撰写多篇调查报告,其中对图书馆的观察和思考主要记录在《调查美国教育报告》《调查美国社会教育报告书》。在这两篇文章中,黄炎培阐明了关于图书馆的 3 个重要问题:其一,图书馆的职责是“补助教育”“促教育精神之普及”;其二,公共图书馆的经费来源是“取之于地方税”“居民产业税”;其三,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由省图书馆、县图书馆、分馆三级组成,“……省图书馆,是为全省图书馆行政之总机关。以省图书馆统各县图书馆,以县图书馆统各该县境内小图书馆及分图书馆”^[8-9]。以上文字,既是考察 20 世纪初美国图书馆事业的珍贵资料,更堪称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的核心要义。

他总结美国图书馆事业发达的 5 个主要原因:一是“以书就人,非令人就书也”,图书馆的选址“必于人多荟萃之所”;二是“所蓄书务合于其社会状况,与其生活所需要也”,为图书馆所服务的特定人群储备符合其需求的图书;三是“用流通方法,置书不多而读者多也”,黄炎培认为,将主要力量用于广设分馆,使得书籍得以流通,不仅方便民



众阅览,也可节省图书馆建设费用;四是“有活动之作用”,图书馆应借助各种手段主动吸引读者;五是“养成图书馆管理员”,并摘录了美国图书馆学的主要课程目次^[9]。

晚清伊始,国内虽有不少人走出国门接触过西方图书馆和西方图书馆观念,但是能够留下文字记述的并不多^[10]。黄炎培是出洋考察的国人中比较早关注到图书馆教育价值、体系化建设及服务理念的一位先驱者,其对于美国近现代图书馆记述之精准、见解之深刻不亚于图书馆学的专业研究者。彼时,我国刚刚经历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公共图书馆运动,各省虽已有不少公共图书馆建成,但藏书楼痕迹仍十分浓重,图书馆建设重点在于筹措经费、寻找馆舍、收藏文献,不在于服务管理。黄炎培作为民国的著名教育家,其文章在当时的学术界和各类知识分子中具有较大影响力,他对于公共图书馆知识的宣传普及,不仅加深了教育界、图书馆界甚至普通民众对图书馆的认识,也为即将到来的新图书馆运动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

3.2 举办图书馆演讲与培训班

赴美考察归来的黄炎培视图书馆为“切要之学术”^[11],除了自己撰文介绍美国图书馆事业,还积极举办图书馆演讲和培训班,传播图书馆知识与观念,培养图书馆专业人才。

在美考察期间,黄炎培从清华留美学务处沈楚纫处获赠1914—1915年留美学生英文题名录,并注意到当时正在美国学习图书馆专业的沈祖荣^[12]。1917年,江苏省教育会注意到此时江苏省各县在陆续筹办图书馆,亟须专门人才对图书馆办理事宜予以指导,而此时的沈祖荣已从美国学成回国数月,于是黄炎培特托余日章转邀其前往江苏省教育会演讲^[13],沈祖荣欣然应允。讲演会于1917年5月1日在上海举行,讲演题目为图书馆功用及办法,黄炎培担任讲演会主席。此次讲演取得了圆满成功,沈祖荣解说“颇为精细”“观者无不称道”^[14]。

黄炎培还曾介绍韦棣华至上海,以“灌输近世界图书馆种种管理法学识”,上海图书馆协会代表杜定友、孙心磐、邓演存等人前往欢迎^[15]。由此两则事例,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黄炎培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深谙发动社会公众关注相关议题之道,以及注重以此种方式在社会上塑造图书馆观念。再以今日中国图书馆史研究中韦棣华和沈祖荣的地位反观之,亦可以看出黄炎培识人的独到之处。

黄炎培总结美国图书馆事业发达的原因之一是“养成图书馆管理员”^[9],因此他也十分重视图书馆

学专门人才的培养。1917年,沈祖荣在上海的图书馆演讲结束后,黄炎培在总结致谢时提出“图书馆之功用及办法既如沈君所云,实为吾国今日最要之事,鄙意尚拟于暑假时设一研究所,再请沈君详为演讲”^[14]。因此可以说,黄炎培是民国时期较早公开提议举办图书馆暑期讲习所的有识之士。而图书馆学短期讲习班在20世纪20年代也的确成为我国缓解专业图书馆员不足的重要模式。

黄炎培不仅是暑期图书馆培训班的倡议者,亦可以说是实际推动者。他自1914年后就长期担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1917年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后就担任董事长、办事部主任等职,1920年发起创办国立东南大学并担任首届校董会办事校董。而前述其担任领导职务的三个机构正是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暑期图书馆培训班的举办机构。早在1922年,国立东南大学与中华职业教育社、江苏省教育会举办的暑期学校中就开设了为期4个星期的图书馆管理法组^[16]。1925年夏,国立东南大学、中华职业教育社与江苏省教育会特邀中华图书馆协会共同举办面向全国图书馆暑期学校^[17]。这届暑期培训是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短期讲习班中规模较大的一场,为缓解图书馆专门人才匮乏、提高图书馆管理水平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事实上,黄炎培担任校董会办事校董时期的国立东南大学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的骨干单位,其在传播图书馆知识方面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举办暑期图书馆培训班,还表现在承办全国教育展览会。1924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发起,联合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中华职业教育社、江苏平民教育促进社、中国科学社共同筹备举办了一场“全国教育展览会”。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组的积极活动下,此次展览会设置了图书馆专场展览。是时,图书馆教育组的主任正是担任国立东南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洪有丰,六位干事中有两位来自东南大学^[4]。

3.3 建设鸿英图书馆

黄炎培身体力行参与筹建国内多个著名图书馆,这些图书馆的建设也同样贯彻其在美国考察期间所形成的观念。以其创办的鸿英图书馆(前身为甲子社)为例,该馆反映了黄炎培的理念:图书馆的馆藏应“合于其社会状况”^[9],满足所服务的特定人群的需求,即创办具有明确服务对象和明确藏书主题的图书馆。

1924年7月,黄炎培提议创立甲子社,因该年为旧历甲子年,故以此为名。1925年3月,甲子社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1717号成立,发表



《人文类辑通启》,指出该社成立的初衷是“约集同志,从事收集关于人群文化之记述,分类度藏,使修学、著书、施政、行事得所依据,命曰‘人文类辑’”,“其目的在供社会一般人之征询”^[18]。1931年,甲子社第六届年会议决,改名人文社,设人文图书馆筹备处。后在黄炎培积极斡旋下,争取到上海实业巨子叶鸿英捐资作为图书馆基金,人文图书馆遂更名为鸿英图书馆^[19-20]。鸿英图书馆是黄炎培投入精力最多的一所图书馆,仅《黄炎培日记》中提到该馆及其相关事项的语句便高达上百处,内容涉及出席馆务会议、询问工作近况、协调人事变动、拟定财务计划、募捐筹款等。

甲子社成立后开展剪报工作,着重搜集过去和当时的重要报纸,选择剪贴加以编排,后兼辑录杂志日报及要目索引。1930年,剪报工作发展为编印《人文》月刊。黄炎培对月刊的编纂十分重视,常亲自搜集资料在刊物上发表。《人文》月刊是我国当时唯一的、也是最早的报刊索引,开后世综合性索引刊物编制之先河。据顾廷龙先生晚年回忆,剪报工作乃是由黄炎培首创^[21]。

至1934年初,鸿英图书馆已有图书35000余册,图表150余幅,报纸40余种,整理史料854000余件,史料目录26册,图书杂志报纸索引卡片95000余张。虽总数不多,但馆藏专注于近代史料之收集与整理,“此在吾国尚属创见也”^[22]。吕绍虞曾言,“读者如需参考中国近百年史料,从事研究工作,到鸿英图书馆去是最好没有的了”^[23]。建国后,由黄炎培主导接洽,将鸿英图书馆捐献给上海市人民政府,其中馆藏杂志留上海市馆,史料归中宣部,报纸由近代史研究所收存^[24]。

4 职业教育发展规划中的图书馆建设

清季以降,教育始终被各界认为是救亡振兴的不二法门,故而成为社会关注的重心^[25]。黄炎培深受教育救国思想影响,以“救中国必以学”的观念投身教育事业,其中尤以职业教育为最重,其职业教育思想发展轨迹大致可分为实用教育(1913—1916)、职业教育(1917—1925)、大职业教育主义(1926年及以后)三个阶段^[26]。在各思想阶段下,黄炎培均将建设图书馆视为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一环。

4.1 实用教育思想阶段的川沙教育图书馆

1913年,黄炎培作为江苏省教育司司长所作的《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将图书馆列入建设计划,为整个江苏省兴办各类图书馆提出了初步的方向性建议。1917年,江苏省教育会因沈祖

荣来沪演讲图书馆之功用及办法,在《致全省各县教育会会员及中等以上各学校书》中提及到“年来各县正陆续筹办图书馆”^[27],《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中的图书馆建设计划在实际中的推进效果可见一斑。而在同年江苏省教育会《致各县教育会及公私立中等以上各学校代募松坡图书馆捐款书》中言及“吾国设施新教育十有余年,所以收效迟迟者,由于缺少教育辅助之机关者半……”^[28],可知此时的江苏省教育界对于图书馆教育功用的认识程度。而这其中必然不乏作为教育司司长、教育会副会长的黄炎培之功,正如胡适在1918年第一次与黄炎培见面后所言“黄先生是当今教育界一个最有势力的人”^[29]。黄炎培此时所持的实用教育思想以及对于举办图书馆的态度,对整个江苏教育界而言有着深刻的影响。

这一阶段的黄炎培提倡实用教育的着力点主要在小学内部,在1916年发起创设面向小学教员的川沙教育图书馆,“以启发人民智识,联络学界,研究教授上之改良进步”^[30]。川沙教育图书馆所购置、征集的图书,限于教育图书、教科参考书及教科图书。除到馆阅读外,小学教员及教育会员等亦可借出阅览。3月19日,图书馆举行开幕式,黄炎培演说图书之内容及读书法。作为其所倡导的读书之法的延伸,黄炎培还提议图书馆给读者发放阅览摘要纸,供读者记录内容要旨、读书心得或疑问等内容,阅后随书归还图书馆,“且读书者一人,而获益者众人,彼此交换,不啻从一人而读无数种书”^[31]。当时《时事新报(上海)》还曾数次刊发川沙教育图书馆阅览摘要,为读者提供交流学习的平台。

4.2 职业教育思想阶段的职工教育馆

为更好地将学生在校期间所学知识转换为毕业后在社会上的谋生本领,黄炎培于1917年提出在推行实用教育时还需要重视职业教育,并谓“实用教育主义产出之第三年,谓是职业教育萌生之第一年”^[32]。他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中将职业教育定义为“用教育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同时尽其对群之义务”^[33]。

1922年,为启迪上海工人群体、增进劳动者幸福,中华职业教育社建设职工教育馆,内设图书馆。图书馆以服务职业教育为宗旨,广征职工修养、技能所需要的书籍。开馆一年后,藏书达四千余册,月入馆阅览者有七百余人^[34]。北伐战争期间,图书馆特增购关于革命之书籍,以便职工时时浏览,增进革命知识^[35]。除图书馆外,职工教育馆内还有一大礼堂位于图书馆楼上,礼堂讲台两侧分别挂着黄炎培所



书的“敬业”“乐群”竖匾。礼堂常用于举办各种活动,如影片放映、戏剧表演、名人演讲等,当时的一众社会名流,包括梁启超、胡适、章太炎、郭秉文、马寅初等,均曾到馆内演讲,演讲主题多以职业教育为主,极大拓宽了工人视野。

沈祖荣曾在《民国十年之图书馆》中对黄炎培发起职工教育馆一事给予高度评价,言“我国工人,向无相当通俗教育机关,以开通智识。是以黄任之先生等,首先发起职工教育馆,以嘉惠工人;馆中分配,有图书馆一座,预备工人娱乐事业,使之看书报,养成乐于求学之心,引起嗜好读书之趣味;希望将来发达,为中国之皮紫百克,康内基工人图书馆”^[36]。

4.3 大职业教育主义阶段的乡村图书馆与业余图书馆

在黄炎培的倡导和推动下,我国近代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全国职业学校数量大幅增长。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衰败,社会对应用型人才需求降低,职业教育办学面临困境。面对残酷现实,黄炎培意识到教育需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联系,就教育论教育注定走向失败。1926年,黄炎培发表《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书》,提出“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的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37]。同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始在农村进行教育改革,在各地建立乡村改进试验区,以黄炎培提出的《试验农村改进计划》为指导思想,该计划有“设图书馆演讲所等,以施通俗教育”的目标^[38]。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华职业教育社办理或代办的乡村改进设施达三十多处,一个个乡村图书馆亦得以建立。

在乡村建立试验区、设图书馆,看似与职业教育无直接联系,实则蕴含着黄炎培的深远用意。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核心要求之一是职业教育社会化,此处的社会化,一方面强调职业教育应与社会相结合,为社会发展培养合适人才,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改造社会为职业教育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图书馆作为传播知识的重要机构,既可在农村培育良好社会风气,提高民众智识水平,又可加强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教育与社会民众的联系,黄炎培将其列入发展计划意即在此。

除在农村进行改革外,黄炎培还提出要拓宽职业教育实施类型,不仅要重视正规职业学校教育,更要重视职业补习教育和职业指导。1927年以后,中华职业教育社先后开办职工补习晨校、通问学塾等业余补习机构,1930年,建立业余图书馆。开馆之

初,业余图书馆仅有藏书五百册,所有书籍均为职教社同人捐赠。当时,该馆读者以补习学校学生和职业青年为对象,此后陆续添购书籍也是按照他们的需求设法补充。读者们对图书馆亦是关怀有加,常将自己阅读后的书籍捐赠给图书馆,职工补习晨校的同学景菊森等人更是赠送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总计两千余册^[39]。如此积少成多,至1936年,业余图书馆已有图书一万余册,杂志百余种^[40]。

业余图书馆读者甚众,月均两千余人到馆阅读。图书馆不仅提供现场借阅,还提供通信借阅服务,读者只需在信中附回件邮票即可借阅馆藏^[41],实为当地职业界人士业余补习、进行自我提升提供了许多便利。

5 黄炎培图书馆观念评述

5.1 黄炎培图书馆观念的来源

黄炎培对图书馆的认识和倡导,首先与其自身求学经历有关。如前所述,蔡元培是黄炎培在南洋公学求学期间的老师,二人并非普通师生关系,蔡元培对黄炎培非常器重,黄炎培亦视蔡元培为恩师和楷模,一生追随,师生间“往来至密”。在黄炎培创办鸿英图书馆时,蔡元培给予了高度认可,“盛获吾师嘉许而乐为之董理焉”^[2]。可见,蔡元培对图书馆的推崇和对黄炎培从事图书馆活动的支持无疑对其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国图书馆经营方法对黄炎培也颇有影响。如黄炎培在谈及川沙教育图书馆、上海东方图书馆的建设时,就曾数次援引其在美国进行教育考察的经历。除此之外,黄炎培还曾在日记中记载了卡内基捐资兴建图书馆的义举,这可能也是黄炎培回国后多次以募捐形式为图书馆筹资的重要因素。

除自身经历外,黄炎培图书馆观念的形成与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也密不可分。面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社会各界均以教育为挽救国家的最为紧迫之事。除学校外,图书馆即为教育的第一机关。20世纪初,清政府学部兼管图书馆;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亦将图书馆划归教育部管辖,以上均体现了国家层面对图书馆作为教育机构的认可。同时,清末公共图书馆建设浪潮与民国新图书馆运动先后兴起,创立新图书馆之风也愈加兴盛。以上这些,都对黄炎培认识图书馆、投身图书馆建设产生了影响。

5.2 黄炎培图书馆观念的特点

黄炎培图书馆观念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肯定图书馆于社会发展的实用教育功能。作为一名教育



家,在其理论体系和思想认知中天然地会将教育的对象划分为不同的层次,且考虑不同层次教育的目的和需求,因此在黄炎培的图书馆观念中,也自然注重配合不同教育对象所处的教育层次及其目的和需求来设置图书馆。纵观黄炎培一生的图书馆实践,可以发现他所创办的图书馆均有明确、具体的服务群体,如鸿英图书馆为人文研究者而设,川沙教育图书馆为小学教员而设,职工教育馆图书馆为工人而设,乡村图书馆为农村民众而设,业余图书馆为职业学校学生而设。这不仅丰富了图书馆的类型,也有助于开发不同群体智能。事实上,黄炎培的图书馆观念发展到后期,对于图书馆功用的认知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其教育功能,作为一名社会活动家,他也高度认可图书馆之于国家建设和社会民主的价值。在1946年,黄炎培应八仙桥青年会图书馆读者团之邀演讲,题为《图书馆与民主运动》^[42]。

其次,黄炎培强调以藏书为中心的图书馆服务与活动。回顾其创办的图书馆,它们大多馆藏体量不大,但所藏之书皆合于读者需求,馆藏极具特色,正所谓书不在多而在精。而图书馆的服务与活动亦是围绕馆藏来进行。以甲子社和川沙教育图书馆为例,甲子社成立之目的,即为学者分门别类皮藏资料,由此延伸专门出版供社会人士征询的索引刊物;川沙教育图书馆为读者发放阅览摘要纸,则是希望读者在阅读馆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形成交流学习的平台,使读者利用有限的书籍、有限的时间,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三,黄炎培还认识到图书馆管理需有专门人才。他考察美国图书馆事业后,认为其图书馆事业发达的原因之一在于拥有专业的图书馆员,回国后亦注意邀请拥有图书馆学专业背景的专家举办演讲,还引导留学生选择攻读图书馆学专业。他在赴法美留学生送别会上曾说,图书馆需管理员,而专学图书馆管理法者太少,因此鼓励留学生们能够分些许心力用于解决此类问题。在黄炎培主持东南大学校董会事务时,他也不忘支持举办图书馆学短期培训班。此外,吕绍虞曾任鸿英图书馆馆长,在吕绍虞欲辞职之时,黄炎培曾数次协商挽留。这些都能反映黄炎培对图书馆学专门人才的重视。

5.3 黄炎培图书馆观念的价值

黄炎培是一位非职业图书馆人,他在公开场合论及图书馆的次数较为有限,也没有发表过专门的图书馆学论著。但是从其为数不多的对图书馆的论述文字以及所从事的活动观之,可以说黄炎培的图书馆观念几乎与同时代的图书馆学研究者比肩,其

精练的总结和观点,即使放之今日仍不过时。

首先,从黄炎培对美国图书馆事业观察和总结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其对图书馆的认识十分深刻,条条扣中经营图书馆的核心要义。黄炎培抓住了图书馆的教育使命、公共图书馆的经费来源与设立、图书馆的选址、图书馆的藏书建设等近现代图书馆发展的关键问题,对于这些关键问题的解决方案也直击要义,可以说其总结的要点与图书馆学经典教材中的理论乃至此后由国际图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公共图书馆宣言》中的倡议都不谋而合。其对美国各州公共图书馆的三级布局体系、图书馆举办活动的重要性的认知,即使对于当代中国图书馆的体系建设仍有启示价值。特别是黄炎培在总结美国图书馆事业发达的第五条原因中,关注到要“养成图书馆管理员”,这是以往出洋考察的国人鲜少关注到的一点。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在不断提倡图书馆专业化,强调图书馆学人才培养的重要性,黄炎培在首次访美考察教育时就能注意到这一点实属难得。

其次,黄炎培作为一名教育家,高度认可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用,这也促使他邀请沈祖荣来沪演讲并亲自主持。彼时的沈祖荣刚从美国修习图书馆学专业归国不久,这位被后世称作“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的一代宗师在当时社会上还没有太高知名度,而黄炎培在当时就郑重邀请其进行演讲,不可不谓具有识才的能力。王玮在其所著的《中华图书馆协会史》中写道,“沈祖荣的第一场图书馆讲演却发生在他回国半年之后,与黄炎培赴美参加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接触到图书馆教育直接相关”^[12]。而沈祖荣在全国巡讲宣传图书馆,也是目前学界比较公认的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且具有关键节点意义的历史事件,标志着新图书馆运动序幕的拉开。从这个角度而言,黄炎培事实上对于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亦功不可没。

6 结语

通过对黄炎培图书馆实践和观念的梳理与分析,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位杰出教育家对于图书馆事业的深厚情怀与卓越贡献,更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将中国近代图书馆发展置于整个社会大变革的历程进行考察。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之所以能够得以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新教育运动中社会各界对图书馆教育价值的高度认同与广泛重视,当时的教育界将图书馆定位为社会教育的核心机构,政府官员与知识精英将其视为开启民智的重要



载体。

纵观图书馆社会价值的叙事发展,文化价值与教育价值向来都是贯穿始终且彼此依存的。但是文化与教育无论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如何紧密关联,在语义和内涵上并非是可以同义替换的,因此文化价值和教育价值的履行也必然存在着区分。当代中国图书馆社会价值与职能履行的叙事可以说在文化价值维度持续发力,而教育价值常常成为文化价值叙事的附属。然而以史为鉴,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影响因素中,教育界对于图书馆教育价值的赋予以及价值实现的期待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因此,当今图书馆事业的持续发展,仍需要考虑在图书馆社会价值与职能履行的叙事中凸显教育价值,并唤醒整个社会对图书馆教育价值的意识。这既是对历史经验的借鉴,也是对当今社会终身学习需求的回应。

谨以此文缅怀黄炎培先生逝世 60 周年。

参考文献

- 程焕文. 冯平山的图书馆事业贡献与景堂图书馆历史档案的价值[J]. 图书馆论坛, 2022, 42(12): 18-31.
- 黄炎培. 吾师蔡子民先生哀悼辞[J]. 国讯, 1940(231): 3-4.
- 黄炎培. 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J]. 江苏教育行政月报, 1913(1): 1-10.
- 李刚, 叶继元. 中国现代图书馆专业化的一个重要源头: 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组的历史考察[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1(3): 79-91.
- 吴稼年. 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孵化器: 中华教育改进社[J]. 国家图书馆学报, 2014(1): 97-103, 83.
- 谢欢. 新教育运动对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影响[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4(3): 115-119.
- 范并思, 邱五芳, 潘卫. 20 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 基于德尔斐法测评的理论史纲[M]. 2 版.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6: 6.
- 郭延谟. 黄炎培君调查美国教育报告[J]. 教育公报, 1916, 2(12): 108-129.
- 黄炎培. 调查美国社会教育报告书[J]. 教育研究, 1916(28): 1-25.
- 程焕文. 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94.
- 图书馆功用办法之演说[N]. 时事新报(上海), 1917-05-04(11).
- 王玮. 中华图书馆协会史[M]. 重庆: 西南大学出版社, 2023: 126.
- 致沈绍期君讲演图书馆办法书[J]. 江苏省教育会月报, 1917(4): 6.
- 演讲图书馆之功用及办法[N]. 申报, 1917-05-02(11).
- 美国图书馆专家韦棣华女士莅沪[N]. 申报, 1925-01-09(11).
- 夏承枫. 民国十一年之暑期教育[J]. 新教育, 1923, 6(4): 571-591.
- 中华图书馆协会图书馆学暑期学校之经过[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1925, 1(4): 2.
- 黄炎培. 一甲记[J]. 人文, 1947, 复刊 1(1): 20-26.
- 陈湘. 黄炎培先生二三事[M]//政协川沙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川沙文史资料(第三辑). 铅印本, 1991: 42-48.
- 李君娜. 从《黄炎培日记》看黄炎培与杜月笙以鸿英教育基金为媒介的交往[J]. 上海地方志, 2020(1): 47-52, 95.
- 严建平. 严独鹤传[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20: 176.
- 明. 人文社图书馆成立[N]. 大公报(天津), 1934-01-20(11).
- 吕绍虞. 上海三大专门图书馆(续)[N]. 文汇报(上海), 1938-10-03(11).
- 黄炎培. 黄炎培日记: 第 12 卷(1952. 6-1954. 9)[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2: 148.
- 桑兵. 治学的门径与取法: 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251.
- 陈国平. 由改良到革新: 从实用主义到大职业教育主义——1913~1927 年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简析[J]. 职业技术教育, 2003, 24(25): 64-67.
- 致各县教育会各会员及中等以上各学校书[J]. 江苏省教育会月报, 1917(4): 7.
- 致各县教育会及公私立中等以上各学校代募松坡图书馆捐款书[J]. 江苏省教育会月报, 1917(2): 1.
- 耿云志, 欧阳哲生. 胡适书信集 1907-1933: 上[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164.
- 创办川沙图书馆[N]. 民国日报, 1916-04-09(11).
- 黄炎培. 黄炎培日记: 第 1 卷(1911. 7-1918. 1)[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8: 231-232, 237.
- 黄炎培. 实用主义产生之第三年[J]. 教育杂志, 1917, 9(1): 15-18.
- 中华职业教育社. 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J]. 教育与职业, 1934(154): 193-195.
- 职工教育馆消息[N]. 民国日报, 1923-04-19(11).
- 本校大事记: 扩大职工教育馆功能[J]. 中华职业学校职业市月刊, 1927(13): 48.
- 沈祖荣. 民国十年之图书馆[J]. 新教育, 1922, 5(4): 60-74.
- 黄炎培. 提倡大职业教育主义同志意见书[J]. 教育与职业, 1926



- (71):1-4.
- 38 中华职教社在华开年会纪(二)[N]. 申报,1926-05-08(7).
- 39 业余图书馆概况[J]. 教育与职业,1934(156):339-341.
- 40 阿木. 中华职教社附设嘉惠职业青年的业余图书馆[N]. 时事新报(上海),1936-03-15(1).
- 41 端木祜增. 业余图书馆近况[N]. 新闻报本埠附刊,1933-12-21(2).
- 42 黄炎培. 黄炎培日记:第9卷(1945.1-1947.8)[M].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146.

作者贡献说明:

李雅君:提出研究主题,获取和分析史料,撰写论文初稿
周旖:设计研究框架,确定史料分析思路,修改论文及定稿,提炼和总结图书馆观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收稿日期:2025年2月25日

修回日期:2025年5月12日

(责任编辑:支娟)

A Study on Huang Yanpei's Library Practices and Conceptions

— In Memory of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His Passing

LI Yajun ZHOU Yi

Abstract: Huang Yanpei, a renowned figure in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and a prominent advoca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lso demonstrated profound insights into the value and function of libraries, active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anship. Despite his significant involvement in the library field, scholarly attention to his engagement with libraries remains limited. On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Huang Yanpei's passing, this paper examines his library-related practices and conceptions, shedding light on his role in China's modern library development. Using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s and drawing upon primary sources such as Huang's published works and writings, diaries, and Republican-era publications, the paper explores how his educational investigation tour in the United States influenced his philosophy and inspired him to integrate library development into broader framework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plans in China. Finally, the paper offers an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his library conceptions. The study finds that although Huang was not a professional librarian, his administrative and intellectual work remained closely linked with libraries throughout his career. Notably, his leadership positions and the affiliated institution chronologically coincided with the pivotal moments in the modern Chinese library development. In 1915, Huang visited the United States to study the education system which also encompassed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library practices. He introduced advanced Western library models to China, emphasizing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libraries, advocating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systematic and service-oriented operations, and calling for professional training of librarians. His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library principles was comparable to that of professional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ers. He organized and promoted national library advocacy through figures like Shen Zurong, Mary Elizabeth Wood and others, marking the starting point of national lecture tour to promote libraries and initiating what became known as the New Library Movement. In this sense, Huang made indispensa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brarianship. As an educator, Huang recognized the professionalism of the librarianship and suppor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short-term librarian training courses while chairing the Southeast University's Board of Trustees. Additionally, Huang emphasized the role of librarie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His vocational education philosophy can be broadly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practical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rand vocational educationism. During the practical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stages, he respectively initi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uansha



Educational Library and the Workers' Education Hall. In the grand vocational educationism stage, he strongly supported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libraries and amateur libraries. In conclusion, Huang's library conceptions can be summarized as: affirming the practical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libraries in social development, emphasizing collection-centered library services and activities, and valuing the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library personnel. These conceptions were shaped by the influence of Cai Yuanpei, inspiration from American library experiences, and the driving force of modern Chinese social education demands. Finally, this paper examines modern Chinese library development with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social reform, based on the value of Huang's library conceptions. It argues that the educational value assigned to libraries by all sectors during the New Education Movement was a critical factor in China's modern library development. The sustained progres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braries depends on highlighting educational value in narrative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unction—both a reflection of historical lessons and a response to the demands of lifelong learning.

Keywords: Huang Yanpei; History of Librarianship; Library History; Vocational Education; Education History



(上接第 119 页)

Encompassing his marital and familial background, his academic pursuits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where he earned a bachelor's degree in library science, a master's in literature (with major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a doctorate in philosophy (also major in political science)—and his subsequent professional career, the research delves into his pivotal role in library technology innovation, management development, library law promotion, an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building. Upon his return to China, Cha held directorships at the compilation department of Boone University, dean librarian in National Chi-Nan University Library in Shanghai and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Library. After moving to the U. S. in 1946, and due to limited library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he initially served as a technical counselor to the China Delegat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He later resumed his library career as a reference librarian at the Queensborough Public Library, where he remained until retirement. Cha's persistent efforts and exceptional acumen catalyze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ibrarianship across diverse sectors. His innovative refinements to the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and reforms in library binding practice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echnical standardization. He actively promoted library law, facilitated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integrated Chinese librarianship into the global discourse. His dedication to fostering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coupled with his profound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management expertise, significantly elevated the professional standards of the field. Cha's scholarly contributions illuminate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brarianship and underscore his pioneering vision. The article provides novel historical data and fresh perspectives on Cha, offering essential academic referenc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brarianship, and restoring a more vivid, multifaceted, and luminous portrait of this previously underappreciated scholar.

Keywords: Lincoln H. Ch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ibrary Career; Academic Achievements